

◆孙力军^①
Li-jun Sun

财政分权、对外贸易与通货膨胀 ——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oreign Trade and Inflation: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摘要：基于相关文献，本文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外贸易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增长竞争不但直接扩大了通货膨胀，还通过对外贸易竞争，扩大了通货膨胀。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样本，发现：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地方财政支出自治率、地方财政支出占比显著扩大了通货膨胀。贸易开放度、贸易非均衡度显著扩大了通货膨胀。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地方财政支出自治率、地方税收管理分权度均显著的促进了对外贸易发展；地方财政支出自治率、地方税收管理分权度导致了对外贸易的非均衡发展。由此表明，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自治权，将更有激励为增长展开竞争，扩大通货膨胀；为鼓励出口而采取的财政扶持和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并导致贸易的非均衡发展，间接扩大了通货膨胀。

关键词：财政分权；对外贸易；通货膨胀；省级面板

中图分类号：F812.3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oreign trade on inflation. In the Chines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he competition for growth not only directly pushes up the inflation, but also through foreign trade competition, pushes up the inflation.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we find that autonomous rate of local fiscal revenue, autonomous rate of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ratio, significantly push up the inflation. Trade openness, unbalanced degree of foreign trade

^①作者简介：孙力军，上海立信会计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邮政编码：201620，邮箱：sljlc@163.com。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解释：财政分权和信贷配给下的理论与实证”（编号：11YJC90160）；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金融资源错配状态下的通货膨胀成因与治理”（编号：13YS113）。

significantly pushes up the inflation. Autonomous rate of local fiscal revenue, autonomous rate of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the management decentralization of local tax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autonomous rate of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the management decentralization of local tax significantly leads to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ore fiscal autonomy of local government, will have make local government more incentive to increase competition for growth, that pushes up the inflation; the fiscal support and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to encourage export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while lead to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rade, indirectly increase inflation.

Key Word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oreign Trade; Inflati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一、引言

从20世纪80年代的财政包干体制,到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如何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仅始终是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也是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由此形成的中国式财政分权,和“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机制,成为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走出了中国独有的经济崛起和“大国发展道路”。但由于中国式财政分权存在的事权和财权的不匹配,“重投资建设、轻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偏向,“重增长、轻民生”的发展模式,其弊端日益突显(王永钦等,2007)^[1]。

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同样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如对外贸易开放度从1978年的10%提升到当前的70%左右。但贸易发展中的非均衡因素和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也与日增加,2005年中国外贸首次出现超过千亿美元的顺差,此后几年,贸易顺差也持续大幅上升。

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次明显的通货膨胀过程,与1985-1988年通货膨胀、1993-1995年通货膨胀相比较,本轮通货膨胀有两个明显变化:一是,从2003年至今,本轮通货膨胀的周期已经超过了10年(中间有起伏),远超过前两次的3年或2年的周期,这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尚属首次。二是,本轮通货膨胀主要表现为资产价格的大幅上升,这是后者不同于前者的最为显著特点(方兴起,2012)^[2]。缓和而漫长的通货膨胀同样会对人民生活 and 福利水平带来严重不利影响,尤其是房价的惊人上涨,已经大大超出了普通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研究财政分权、对外贸易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研究,是一个热点问题,也是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但鲜有文献将三者联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通过三者关系的研究,也可以进一步挖掘财政分权对通货膨胀影响的传导机制,弥补现有研究不足。在实证方法上,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展开研究。面板数据模型具有信息量大,能够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和控制地区发展差异的优点,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计量分析中。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提出理论综述与研究框架;第三部分是变量和数据;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理论综述与研究框架

（一）中国式财政分权与“为增长而竞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财政分权化改革。第一次是1980年代中期的“财政包干制”,第二次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目前,中国已经在分税制的框架下,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体系。总体而言,中国式财政分权具有以下特征:(1)财政分权从属于行政集权,经济上的分权与政治上的集权并存;(2)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部分支出责任,对财政资金的使用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决策权;(3)财政收入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地方税种的税率和税基没有决定权;(4)地方财政收支缺口由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及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来弥补(龚峰和雷欣,2010)^[3]。这一制度设计构成了我国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制度基础:一方面,上一级政府任命下一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即官员。官员的任职和职务晋升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绩效挂钩,这构成了“为增长而竞争”的政治激励。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财税权较小,却承担着辖区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就业保障、基础设施的主要责任,即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这迫使地方政府必须千方百计扩大财政收入,此为财政激励。但过于强调财政收入,会加大地方经济税负负担,对经济增长不利,从长远看,也不利于财政收入增长。因此,在中国式分权的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下,各级官员和公务员都导向一个共同目标,即“为增长而竞争”。这一激励机制成为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王永钦,2007)^[1]。不容忽视的是,这一制度设计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诸多不和谐因素的体制根源,如重投资建设、轻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结构偏向,“重增长、轻民生”的发展模式,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地区间的市场分割、重复建设和效率损失等。“为增长而竞争”带来的副作用可能正在上升(王永钦等,2007^[1];傅勇和张宴,2007^[4])。

（二）中国式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

经济上分权,政治上集权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增长竞争激励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也加大了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周业安,2008)^[5]。财政分权是通货膨胀的制度根源,而货币供应量增加和投资过度膨胀只是表层因素,财政分权通过提高货币供应量和投资增长率间接加剧了通货膨胀(许煜等,2007^[6];余长林和王瑞芳,2008^[7])。方红生和朱保华(2008)^[8]认为以经济增长速度指标作为考核地方官员业绩的政治激励模式下,财政主导的非李嘉图制度在中国更具有适用性。这意味着价格水平主要由财政政策决定,而中国式分权下的政府扩张偏向决定了价格的长期上涨趋势。赵文哲(2010)^[9]认为中国式分权下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通过“财富效应”、“铸币税效应”、“生产效应”和“内部需求效应”导致通货膨胀。林勇和卓玛草(2013)^[10]发现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预算软约束的相互作用会激励地方政府无论在经济衰退还是繁荣期都采取偏向扩张的政策,进而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刘洪铎(2011)^[11]证实,地方政府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规模是现行财政分权体制造成的。而一般认为财政赤字会诱发通货膨胀。另外,财政分权还使得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吴群和李永乐,2010)^[12],进而推升了房地产价格(李勇刚和李祥,2012^[13];杨君茹和邱晨,2012^[14])。

（三）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对外贸易

对外开放和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国策。出口和对外贸易，与固定资产投资，共同构成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双引擎”。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为出口而竞争”就是“为增长而竞争”的自然逻辑延伸。为促进出口和对外贸易发展，政府在对辖区内出口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和财政扶持政策，如税收减免、税收先征后返、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等，达并考核出口指标，以促进各类企业的出口（王德祥和李建军，2008）^[15]，从而极大的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中国产品在世界上的竞争力，进而增加了出口。通过这些优惠政策，出口企业可以以极低的价格获得基本的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结果是偏向于出口的产业出现投资过度，而当这些投资完成的时候就形成了过剩的生产能力。由于财政分权导致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与重复建设，这些过剩的生产能力最终只能通过出口来消化（许煜等，2007）^[16]。同时，中国式财政分权下，“重增长，轻民生”的发展模式，使得劳动力市场扭曲，劳动力要素价格和人力资本投资长期处于低水平，劳动力要素报酬占 GDP 的比例已经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 50% 下降到 2011 年的 35%。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跟不上经济增长的步伐，使得内需不足，过剩的生产能力也不得不转为出口。可见，中国式财政分权虽然极大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也是对外贸易非均衡发展的体制性根源。

（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与通货膨胀

国外学者一般认为，对外贸易发展和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Romer（1993）^[17]构建了一个最优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模型，发现，贸易开放度提高，减少了产出超过自然水平得到的好处，社会福利函数中产出的重要性随贸易开放度提高而降低，代表产出与通胀替代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将更加陡峭，使得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效应大于产出效应，货币当局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动机更小和更加谨慎，因此均衡通胀率更低。利用 1973-1988 年 114 个国家的数据，以进口占 GDP 比重作为贸易开放度的衡量指标，回归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越开放，国内的通胀率越低。Lane（1997）^[18]在小国开放经济的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建立了一个以福利为基础、区分了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两部门政府行为模型。模型发现，贸易开放度越高，非贸易部门所占的比重越小，意外货币扩张引起的福利增加就越小。因此，在贸易开放度越高的经济体中，货币当局采取通货膨胀政策的动机越小。Terra（1998）^[19]发现：在债务水平高的国家，贸易开放对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原因是，贸易开放度更高的国家能够通过贸易盈余偿还债务，而不用征收通货膨胀税来偿还，因此通胀率更低。Temple（2002）^[20]认为高的通货膨胀率通常会导致不受欢迎的真实汇率的波动，所以在越是开放的经济体中，观察到更陡峭的菲利普斯曲线和更高的通货膨胀成本，进而导致均衡的通货膨胀率更低。Gamber 和 Hung（2001）^[21]提出商品竞争假说和国外过剩生产能力假说，考察了 1990 时期美国经济日益全球化是否有助于维持低的通货膨胀。发现：国外较高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能够很大程度上解释近年来美国的低通货膨胀率。

但就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来看,随着我国贸易开放度的迅速提高,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日益增加,对外贸易的非均衡的发展也日益突出,也可能使得我国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从内部看,主要是持续的贸易顺差导致我国外汇储备不断累积,倒逼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加大通货膨胀压力。从外部看,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使得我国经济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

(1) 国际价格传递效应。随着中国贸易对外依存度的不断加深,在我国汇率制度缺乏弹性的情况下,国际市场波动必然通过国际价格传导渠道影响本国宏观经济稳定。当国外出现通货膨胀的时候,价格的上涨会减少本国居民对国外进口商品的消费,转为增加对本国商品的消费需求,提高国内商品的价格水平。同时国际市场上石油和原材料等价格上涨,导致国内基础性产品的输入价格提高,从而增加国内企业的成本,最终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22]的实证研究发现短期内,国际食品价格是导致国内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胡援成和张朝洋(2012)^[23]应用有向无环图方法(DAG)及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发现我国当前面临较大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就国内工业品价格而言,国际能源价格、食品价格和金属价格的传导效应都很显著,而居民消费品价格主要依赖食品价格传导。

(2) 贸易顺差效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增长率大于进口贸易增长率,导致贸易顺差增加,进而产生引发通货膨胀的压力。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进出口贸易一年平衡,两年顺差,其余七年逆差,合计逆差42.9亿美元;但从1990年起,除1993年外我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抵消1993年的逆差121.2亿美元,1990-2005年,累计顺差达3977.5亿美元。2005年,中国外贸开始出现超过千亿美元的顺差,当年顺差达到1018亿美元。此后几年,贸易顺差也持续大幅上升,2006年顺差1770亿美元,2007年顺差2622亿美元,2008年顺差2954亿美元。持续的大幅度贸易顺差会造成国内总需求水平大于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的上涨。并且一国为促进贸易收支改善所实行的货币贬值,在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的情况下会改善贸易收支,进而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

从国家货币层面看,贸易项目顺差的持续累积,在固定汇率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不能根据外汇市场的供求灵活调节,如果不考虑统计误差和遗漏,国际贸易顺差就会导致等量的外汇储备增加。由于外汇不能在中国市场直接流通,中央银行为买入外汇需要大量本币,形成外汇占款,随着外汇占款的增加,基础货币投入量随之增加。基础货币的增加通过商业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机制,形成数倍于基础货币的银行信贷或货币供应量,从而引起价格水平的上涨。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贸易、资本项目双顺差大幅度扩大,外汇储备总额不断增加,截至2014年第1季度,已增至3.98万亿美元,无形中构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巨大压力。方先明等(2006)^[24]发现2001年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具有明显的通货膨胀效应。高瞻(2010)^[25]发现外汇储备变动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变动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曲强等(2009)^[26]发现中国的外汇储备变动具有明显的通胀效果,

而货币冲销对物价有平抑作用。

（五）研究框架的提出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待检验假说：中国式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显著正相关，并且中国式财政分权通过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并导致对外贸易的非均衡发展，间接提高了我国通货膨胀水平。在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测度问题上，单一指标不能全面反映财政分权的状况，不同的分权指标，其增长效应也不尽相同（龚峰和雷欣，2010）^[3]。基于此，本文接下来，借鉴龚峰和雷欣（2010）^[3]构建的六个财政分权指标，即财政收入自治率、财政收入占比、财政支出自治率、财政支出占比、税收管理分权度、行政管理分权度，全面验证财政分权、对外贸易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三、模型设定、变量和数据

为实证检验中国式财政分权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和财政分权通过对外贸易间接影响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本文设定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如下：

$$\text{Gdpindex}_{it} = \beta_1 + \beta_2 \text{Fiscal_decentralization} + \beta_2 \text{Trade} + \beta_3 \text{Trade_dif} + \sum \beta \text{Control} + \alpha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text{Trade}_{it} = \beta_1 + \beta_2 \text{Fiscal_decentralization} + \sum \beta \text{Control} + \alpha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text{Trade_dif} = \beta_1 + \beta_2 \text{Fiscal_decentralization} + \sum \beta \text{Control} + \alpha_i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方程 1 检验财政分权、对外贸易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方程 2 检验财政分权对整体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方程 3 检验财政分权对对外贸易非均衡发展的影响。 β 为待估系数， α_i 表示选取固定效应模型时各地区有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 ε 代表残差项。本文所用数据集为中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 2001-2007 年的面板数据。

各变量定义和相关数据来源说明如下：

（1）Gdpindex：通货膨胀指标。用 GDP 平减指数衡量，定义为：名义 GDP 与实际 GDP 的比值。与 CPI 和 PPI 等其他价格指数相比，GDP 平减指数能够全面反映一个地区价格水平的波动情况。本文采用以 2000 年=100 折算出 GDP 平减指数的定基数据。

（2）Fiscal_decentralization：财政分权指标。采用龚峰和雷欣（2010）^[2]提供的财政分权的多维测度指标，具体包括：①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 Rev_au：地方本级预算收入占地方预算总收入的比例，其中预算收入为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的加总。②地方财政收入占比 Rev_ra：地方人均本级预算收入占中央和地方人均本级预算收入的比例，再乘以一个经济规模缩减因子 $[1-\text{GDP}_i/\text{GDP}_N]$ （ GDP_i 为第 i 省国内生产总值， GDP_N 为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剔除各地区经济规模的影响。③地方财政支出自治率 Exp_au：地方本级预算支出扣除中央转移支付后的余额占地方预算总支出的比例。其中，预算支出等于预算内支出加预算外支出。④地方财政支出占比 Exp_ra：地方人均本级预算支出占中央和地方人均本级预算支出的比例，再乘以经济规模缩减因子 $[1-\text{GDP}_i/\text{GDP}_N]$ 。⑤税

收管理分权度 Tax_ad : 省地方税务局职工数除以省国税和地税的职工总人数。⑥行政管理分权度 Exp_ad : 省万人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职工人数占全国万人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职工人数的比例, 再乘以经济规模缩减因子 $[1-GDP_i/GDP_N]$ 。

(3) $Trade$ 和 $Trade_dif$: 对外贸易指标。具体包括: ①整体的贸易开放度 $Trade$: 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例。②非均衡的贸易发展 $Trade_dif$, 各地区进出口差额占 GDP 的比例。进出口额原始数据以美元计价, 本文按年度平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换算为以人民币计价。

(4) $Contra$, 其他控制变量。具体包括: ①资本产出比率 $Capital$: 各地区年末资本存量占当年 GDP 的比例。关于各地区的资本存量, 用现有文献常用的永续盘存法估计。这一方法可以记作 $Cap_{it} = Cap_{it}(1-\delta_{it}) + I_{it}$ 。张军等 (2004) 采用的当年投资 I 指标为当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采用的各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 δ 为他们计算出的 9.6%。我们沿用其估算方法、参数赋值以及他们已经估算出的 2000 年各省年末资本存量数, 并使用各省统计年鉴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测算出各个省份 2001-2012 年的年末资本存量数据。②劳动产出比率 $Labor$: 各地区年末从业人数占 GDP 的比例。③消费产出比率 $Consume$: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 GDP 的比例。④ Fdi : 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的比例。⑤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 社会融资总量占 GDP 的比例。社会融资总量是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 是一个更全面的刻画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⑥财政规模 $Fiscal$: 各地区财政收支总额占 GDP 的比例。⑦城镇化率 $Town$: 各地区城镇人口占各地区常住总人口的比例。

以上各变量的数据中, 财政分权各指标的数据来自龚峰和雷欣 (2010) 的计算, 其他变量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表 1 变量定义与计算方法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计算方法
通货膨胀指标	Gdpindex	各地区 GDP 平减指数	名义 GDP/实际 GDP, 折算为定基数据 (2000 年=100)
财政分权指标	Rev_au	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	地方本级预算收入占地方预算总收入的比例, 其中预算收入为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的加总。
	Rev_ra	地方财政收入占比	地方人均本级预算收入占中央和地方人均本级预算收入的比例, 再乘以一个经济规模缩减因子 $[1-GDP_i/GDP_N]$ (GDP_i 为第 i 省国内生产总值, GDP_N 为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Exp_au	地方财政支出自治率	地方本级预算支出扣除中央转移支付后的余额占地方预算总支出的比例, 其中预算支出等于预算内支出和预算外支出的加总。
	Exp_ra	地方财政支出占比	地方人均本级预算支出占中央和地方人均本级预算支出的比例, 再乘以经济规模缩减因子 $[1-GDP_i/GDP_N]$ 。
	Tax_ad	税收管理分权度	省地方税务局职工数除以省国税和地税的职工总人

	Exp_ad	行政管理分权度	数。 省万人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职工人数占全国万人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职工人数的比例，再乘以经济规模缩减因子 $[1-GDP_i/GDP_N]$ 。
对外贸易指标	Trade	贸易开放度	地区进出口总额/地区 GDP
	Trade_dif	贸易非均衡度	各地区进出口差额/地区 GDP
其他控制变量	Capital	各地区资本产出比率	地区年末资本存量/地区 GDP
	Labor	各地区劳动产出比率	地区年末从业人员/地区 GDP
	Consume	各地区消费水平	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区 GDP
	Fdi	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	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地区 GDP
	Finance	各地区金融发展	地区社会融资总量/地区 GDP
	Fiscal	各地区政府经济参与度	地区财政收支总额/地区 GDP
	Town	各地区城镇化水平	地区城镇人口/地区常住人口

四、实证检验

利用 Stata12.0 对(1)式、(2)式、(3)式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列于表 2 和表 3。利用 Huasman 检验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除表 3 模型 1 支持随机效应模型外，其他均支持固定效应模型。各表只列出了财政分权各指标中在 10%或以上水平上显著的指标，回归结果不显著的指标未列出。

从表 2 看出，资本（资本产出比率在 1%水平上与 GDP 平减指数正相关）、政府经济参与度（财政收支总额占 GDP 的比例在 1%水平上与 GDP 平减指数正相关（模型 1、2 和 4））、城镇化（城镇化率在 1%水平上与 GDP 平减指数正相关）显著扩大了通货膨胀，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资本形成扩大通货膨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就业和劳动（劳动产出比率在 1%水平上与 GDP 平减指数负相关）、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 GDP 的比例在%水平上与 GDP 平减指数负相关（模型 1 和模型 2））显著降低了通货膨胀水平。在对外贸易的相关指标中，整体的贸易开放度（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例在 1%水平上与 GDP 正相关）、贸易非均衡度（进出口差额占 GDP 的比例在 1%水平上与 GDP 正相关）显著扩大了通货膨胀。综合这些实证结果，很好的印证了投资驱动、政府主导和出口导向作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驾马车”，同时也是影响通货膨胀的“三驾马车”。

表 2 回归结果（方程 1：以 GDP 平减指数为被解释变量）

	(1)	(2)	(3)	(4)
	Rev_au	Exp_au	Exp_ra	Exp_a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188.80*** (42.03)	148.29*** (11.32)	352.96*** (113.32)	-116.67*** (27.46)
Trade	77.62*** (13.19)	75.64*** (12.68)	101.80*** (13.36)	95.38*** (12.80)
Trade_difference	117.95*** (28.44)	100.77*** (27.87)	137.16*** (29.11)	123.52*** (28.49)

Capital	34.51*** (10.82)	29.96*** (10.55)	37.97*** (11.08)	51.33*** (11.00)
Labor	-60.57*** (11.59)	-69.58*** (11.41)	-41.19*** (12.84)	-74.41*** (12.37)
Consume	-171.84*** (58.03)	-145.89*** (55.12)	-95.34 (58.85)	-55.79 (58.93)
Fdi	7.63 (30.51)	-6.56 (29.52)	2.33 (31.36)	-1.59 (30.67)
Finance	1.10 (23.11)	-14.94 (22.68)	45.26* (26.34)	8.62 (23.17)
Fiscal	337.12*** (71.37)	213.20*** (71.60)	116.90 (99.04)	342.20*** (71.84)
Town	874.06*** (96.43)	832.36*** (94.35)	702.60*** (112.73)	725.04*** (103.23)
_Cons	-413.20*** (53.14)	-331.38*** (49.73)	-504.88*** (72.31)	-199.39*** (62.72)
Model	FE	FE	FE	FE
Hausman	143.62	142.85	140.59	138.07
N	210	210	210	210
R ²	0.90	0.90	0.89	0.89

注：*、**、***分别表示 10%、5%和 1%显著性水平。

表2显示，在财政分权各指标中，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地方财政支出自治率、地方财政支出占比在1%显著水平上扩大了通货膨胀。由此表明，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事权责任，由地方政府配置和使用更多的财政资金，使地方政府有更强的激励和更多的财力为增长展开竞争，导致财政支出投向的“重基础设施建设、轻社会福利支出”、“重资本生产、轻劳动收入”的结构性偏向，从而扩大了通货膨胀。行政管理分权度在1%显著水平上降低了通货膨胀。可能的原因是：行政管理分权度越高，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和支出决策越有可能受辖区居民偏好的影响。而辖区居民更多是偏好政府安排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和提高居民福利，控制物价也是增进居民福利的重要举措，从而对通货膨胀具有抑制作用。

表 3 回归结果

	方程 2：贸易开放度为 被解释变量				方程 3：贸易非均衡度为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7)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Rev_au 1.16*** (0.18)	Exp_au 0.49*** (0.14)	Exp_ra -1.72*** (0.63)	Tax_ad 1.26*** (0.27)	Rev_ra -0.21* (0.13)	Exp_au 0.18*** (0.10)	Tax_ad 0.24* (0.12)
Capital	-0.20*** (0.05)	-0.18*** (0.06)	-0.13** (0.06)	-0.21*** (0.06)	-0.02 (0.03)	-0.03 (0.02)	-0.03 (0.02)
Labor	0.15*** (0.04)	0.10 (0.06)	0.08 (0.07)	0.17*** (0.06)	0.07** (0.03)	0.04 (0.03)	0.07** (0.02)
Consume	-1.47***	-1.36***	-1.41***	-1.24***	-0.01	-0.09	-0.07

	(0.27)	(0.31)	(0.31)	(0.30)	(0.15)	(0.14)	(0.14)
Fdi	-0.11 (0.17)	-0.27 (0.17)	-0.25 (0.17)	-0.25 (0.17)	-0.02 (0.08)	-0.02 (0.08)	-0.02 (0.08)
Finance	-0.13 (0.132)	-0.19 (0.13)	-0.30** (0.14)	-0.22* (0.13)	-0.11* (0.06)	-0.11* (0.06)	-0.11 (0.06)
Fiscal	1.43*** (0.30)	1.26*** (0.41)	2.69*** (0.52)	1.41*** (0.39)	0.15 (0.18)	-0.03 (0.19)	0.07 (0.18)
Town	2.00*** (0.25)	1.38*** (0.54)	2.37*** (0.60)	1.85*** (0.52)	0.80*** (0.24)	0.71*** (0.24)	0.85*** (0.24)
_Cons	-0.65*** (0.18)	-0.002 (0.29)	0.66 (0.40)	-0.60 (0.30)	-0.25 (0.14)	-0.29** (0.13)	-0.42 (0.14)
Model	RE	FE	FE	FE	FE	FE	FE
Hausman	8.77	19.05	19.52	26.64	29.98	28.98	31.96
N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R ²	0.84	0.78	0.57	0.62	0.10	0.13	0.11

注：*、**、***分别表示 10%、5%和 1%显著性水平。

表3看出，资本与贸易开放度显著负相关，劳动与贸易开放度（模型1、模型4）和贸易非均衡度（模型5、模型7）显著正相关，表明我国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是劳动，这与我国劳动禀赋充裕的现状一致，同时，丰富的劳动力是我国出口持续大于进口，贸易顺差不断拉动的原因。内需增加对贸易开放度有负面影响，金融发展对贸易开放度、贸易非均衡度有负面影响。政府经济参与度、城镇化显著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表 3 显示，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地方财政支出自治率、地方税收管理分权度在 1%水平上均显著的促进了对外贸易发展；地方财政支出自治率在 1%显著水平上、地方税收管理分权度在 10%显著水平上，导致了对外贸易的非均衡发展。由此表明，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对促进本辖区对外贸易发展不遗余力，当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财政资金的使用权和支配权，拥有更大的税收征管自主权或控制权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出大力扶持企业出口创汇，通过调整税收征管力度，对出口企业进行出口退税和其他税收优惠，促进本地对外贸易发展，这也是出口持续大于进口，贸易非均衡发展的原因所在。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在 10%水平上与贸易开放度负相关，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在 10%水平上于与贸易非均衡度负相关。可能的原因是，地方财力相对雄厚的地区相比较财力相对薄弱，政府对发展对外贸易的积极性比地方财力相对薄弱的地区下降了。因此，适时调整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以提升内需为导向，降低地方政府为出口而竞争的程度，规范地方政府的偏向于出口的税收优惠政策，制定促进内需的税收政策，有利于纠正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实现贸易均衡发展。

五、结论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我们发现：在控制了一系列变量后，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地方财政

支出自治率、地方财政支出占比在1%显著水平上扩大了通货膨胀。贸易开放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在1%水平上与GDP正相关）、贸易非均衡度（进出口差额占GDP的比例在1%水平上与GDP正相关）显著扩大了通货膨胀。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地方财政支出自治率、地方税收管理分权度在1%水平上均显著的促进了对外贸易发展；地方财政支出自治率在1%显著水平上、地方税收管理分权度在10%显著水平上，导致了对外贸易的非均衡发展。由此表明，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事权责任，同时赋予地方在财政收支方面更多的支配和控制权，使地方政府有更强的激励和更多的财力为增长展开竞争，财政支出偏重于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而不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从而扩大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财政自治权越大的地区，政府更有激励通过财政扶持和税收减免鼓励企业出口创汇，促进本地对外贸易发展，同时，这也是导致贸易非均衡发展的体制性因素；而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又因为国际价格传递效应和贸易发展非均衡，扩大了通货膨胀，因此，中国式财政分权“为对外贸易而竞争”，通过促进贸易发展，间接扩大了通货膨胀。

基于实证结论，本文的建议是：（1）适当控制地方自有财力的规模，更多地通过转移支付资金为地方财政支出融资，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和监督管理职能，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的投资和经济增长偏向，从而降低通货膨胀压力。（2）适时调整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以提升内需为导向，规范地方政府的单方面有利于出口的税收优惠政策，制定促进内需的税收政策，有利于纠正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进而降低通货膨胀压力。

当前，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态势不断加剧。在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各项制度设计不完善的背景下，盲目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税收和财政支出自主权，不仅无助于社会福利的增进，而且还会增大宏观经济运行的通货膨胀压力，影响经济稳定。因此，中国分权体制改革的重点应当是纠正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完善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税权分配制度，约束和规范横向政府间的竞争行为，将“事实型分权”转变为“制度型分权”，从而在发挥财政分权的生长效应的同时，尽量降低对价格的冲击，实现经济稳定。

参考文献

- [1]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 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J]. 经济研究, 2007,(1).
- [2]方兴起. 当前通胀: 新视角下的重新认识[J]. 学术研究, 2012,(4).
- [3]龚峰、雷欣.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数量测度[J]. 统计研究, 2010,(10).
- [4]傅勇、张宴.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 管理世界, 2007,(3).
- [5]周业安.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J]. 管理世界, 2008,(3).
- [6]许煜、徐翱、尚长风. 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与宏观经济绩效——财政分权的宏观收益与成本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 2007,(6).

- [7]余长林、王瑞芳. 论财政分权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J].当代经济研究,2008,(10).
- [8]方红生、朱保华. 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J].管理世界,2008,(3).
- [9]赵文哲. 基于省际面板的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2009,(10).
- [10]林勇、卓玛草. “双刃剑”上的中国财政分权——基于经济增长和波动效应的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3,(3).
- [11]刘洪铎. 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的膨胀吗?——来自分税制改革后中国省级的观察和经验证据[J].上海经济研究,2011,(9).
- [12]吴群、李永乐.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土地财政[J].财贸经济,2010,(7).
- [13]李勇刚、李祥.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房价波动:中国 35 个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J].软科学,2012,(1).
- [14]杨君茹、邱晨. 财政分权、政府投资与房产价格——兼议中国式分权的代价[J].宏观经济研究,2012,(9).
- [15]王德祥、李建军.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外贸依存度——基于 1978-2007 年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8,(11).
- [16]许煜、徐翱、尚长风. 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与贸易收支顺差[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7,(11).
- [17]Romer, D. Openness and Infl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 Vol. 108, PP. 870-903.
- [18]Lane R. Inflation in Open Economies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42): 327-347.
- [19]Terra, T.C. Openness and Inflation: A New Assessment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 Vol.113, PP.641-648.
- [20]Temple, J. Openness, Inflation, and the Phillips Curve: A Puzzle [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02, Vol. 34, PP. 450-468.
- [21]Gamber N. J H Hung. Has the rise in globalization reduced U.S. inflation in the 1990s? [J] Economic Inquiry, 2001, (39): 58-73.
- [22]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外部冲击与中国的通货膨胀[J]. 经济研究, 2008,(5).
- [23]胡援成、张朝洋. 美元贬值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传导途径及其效应[J]. 经济研究, 2012,(4).
- [24]方先明、裴平、张谊浩. 外汇储备增加的通货膨胀效应和货币冲销政策的有效性——基于中国统计数据的实证检验[J]. 金融研究, 2006,(7).
- [25]高瞻. 我国外汇储备、汇率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基于国际收支视角的分析[J]. 国际金融研究, 2010,(11).
- [26]曲强、张良、扬仁眉. 外汇储备增长、货币冲销的有效性以及对物价波动的动态影响——基于货币数量论和 SVAR 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 2009,(5).